

然提出的问题,而变化的世界也需要世界各国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为此应做好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还应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

会结构,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以此作为面向世界和立足世界的基础。○

传统智慧与奥运会后的中国外交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授)

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结束,“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一词迅速蹿红,其内涵也日益引人注目,特别是“后奥运时代的中国外交”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空前提升,大国地位得到广泛承认。德国 ZDF 电视台评论说,“一个世界大国诞生了”,而北京奥运会正是中国正式成为世界大国的“加冕礼”。自此以后,无论是世界看待中国,还是中国看待世界的眼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百多年来落后挨打的受害者心态也在改变,开始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平视世界。因此,有国外媒体评论说:“奥运会后,世界将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

但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威胁论”、特别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威胁论”有可能再度高涨,“中国责任论”也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此新形势和新挑战面前,中国外交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答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但简单说来,答案无非是两条:一是以不变应万变,二是以万变求不变。前者是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始终不渝”: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既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和长期战略,这一大方向不会因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改变。后者是说,要研究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并采取各种相应的对策,以保证和平发展的大战略能够长期实行下去,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期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

首先,应该清醒地看到,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大

国,中国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断增加,一方面,这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外交的选择余地反而变小了。而且,大国就像明星,既享受着羡慕和崇敬的目光,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往往不是身处逆境之时,而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因此,中国更需要冷静、清醒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甚至盲目自大。

其次,要警惕所谓奥运后效应。长期以来,服务奥运这个大局成为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此,包括外交工作在内,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了低调和克制。奥运会之后,各方面的工作将逐渐回归常态。在此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某种“秋后算帐”的心态。比如,已经出现了一种声音,要求将中国因成功举办奥运会而提升的国力“发挥到极致”,要求有“大动作”。如果这种声音过大,就会给奥运会后的外交工作带来巨大压力,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此外,从外部看,也存在着某种“秋后讨帐”的倾向:一是一些大国对奥运会给予了某种程度的支持,奥运会后有可能要求得到回报;二是在奥运会前和奥运会期间,有些国家将可能对与中国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问题推到了奥运会之后,因此,奥运会后我们可能面对一些于我不利的局面,比如美国的对台军售。

第三,要看到国内外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差距。2008年皮尤世界民情调查显示,77%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正面的。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28日一篇文章中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英国《金融时报》今年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欧洲人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在日本,情况也很类似。《读卖新闻》8月4日发表文章指出,根据《读卖新闻》社和《瞭望东方周刊》进行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而中国对日本的想法则全面好转。关于目前的中日关系,日本36%的受访者认为“关系良好”,但有57%的人认为“关系恶劣”;而在中国,认为“良好”的有67%,认为“恶劣”的只有29%。奥运会后情况有所变化,但上述局面并未根本改变。这一认知差距潜藏着一定的危险性,势必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奥运会后中国将面临更多的非传统安全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的压力和挑战增大,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越高、影响越大,这种压力和挑战就越大。相对来说,中国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非政府组织非常复杂,形式多样,聚散不定,防不胜防,传统国家机器虽然强大,却无法找到明确的目标和着力点,难以发力。中国外交通常比较善于同政府和政府组织打交道,却缺乏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在实践中往往陷入被动。另一方面,在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将面临日益增强的国际压力。北京奥运会以“绿色奥运”为口号,采取果断而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这也新树立了很高的标准,要坚持下去并不容易。从现实看,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关注和重视,无论是在APEC峰会还是在八国集团峰会上,环境问题都成为重要乃至首要议题。特别是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即将来临的背景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凸显。而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迅速增长,据预测,今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可以预见,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那么,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些新的重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求助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和智慧。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恢弘的气势展示了古老的

中国文明,但在华丽表象的背后,这一古老文明的精髓是什么?除了“和”字所展示的和平、和谐及以和为贵的精神,对于奥运之后的中国外交来说,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可以说,在奥运会后的大背景下,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建设中国的软实力,进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工作新的历史使命。在这一问题上,又尤其以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内修其德,外行王道,着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先圣先哲历来重视文德理义的教化作用。管子说:“明主内行其法度,外行其理义,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孔子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畏威不如怀德,霸道不如王道,修德、行王道,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美德,占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这是中国的软实力。

二是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观是开放的普世主义,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古老的天下观正显示出新的价值。奥运之后的中国外交应发扬这一优秀传统,以应对所谓中国民族主义威胁论。

三是慎大忌满,中庸适度,降低成功的风险。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尚书》中传诵千古的箴言“满招损,谦受益”所表达的深刻哲理,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团体、组织以至国家。《吕氏春秋》之“慎大”篇说:“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更直接、明确地指出,在强大和顺利的时候,要看到困难和危险,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一直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安全观之中。今天,在奥运成功,举世瞩目,国威大振,国民自信心空前高涨,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回顾古人智慧,更具特殊意义。所谓月盈则亏,物极必反,祸福相倚,也是这个道理。它告诫我们,越是在顺利的时候,越要看到困难和危险,切忌骄傲自满,得意忘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既要乘奥运东风,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又要戒骄戒躁,把握节奏,张弛

有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妨适当降降温,做一点减法,以免动静失调,阴阳失衡,满而招损。

四是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前所述,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奥运会后在环境问题上势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国际压

力。更为重要的是,环境问题也正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因此,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伟大智慧,无论是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对应对环境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建设和谐世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求平衡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08年 8月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外交的“后奥运时代”已经来临。如何看待“后奥运时代”?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第一,“后奥运时代”是各种奥运效应发酵、围绕着奥运主办而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时代;第二,“后奥运时代”是奥运主办国如何及时、合理与科学地开发和运用好奥运效应、促进国家发展和提升对外关系的时代;第三,“后奥运时代”是“两个大局”的统筹变得更加复杂化的时代。总之,“后奥运时代”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意识”需要明确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迫切化、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紧密化”的新时代。

目前,西方评价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奥运会大大加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自信心,让中国从举办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中继续热衷于显示实力,中国外交会因此更加积极和具有扩张性;另一种观点是,奥运会大大煽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强化了中国外交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外交在“后奥运时代”将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的攻击性。显然,西方媒体对中国外交今后发展趋势的这两个判断,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不准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中国媒体宣传当然有爱国主义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浓郁的国际主义,是中国社会和人民在开放、合作和友情的基础上探索和放大的奥运盛事的国际意识。例如,CCTV花了很多时间采访、报道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牙买加运动员博尔特、俄罗斯运动员伊

辛索娃以及日本运动员北岛康介。CCTV5的深度报道节目“奥运荣誉堂”请来了美国体操运动员约翰逊和德国击剑运动员福斯特等。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媒体报道了美国传统使用奖牌总数、而不是金牌总数作为奥运奖牌榜的排序方式时,这一美国“算法”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所接受。温家宝总理 8月 23日在会见美国劳工部长赵晓兰时,恭喜美国获得了北京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中国民众相当程度上从以往的“奥运金牌热”中摆脱出来,认同“奖牌数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综合体育实力”的提法。中国媒体也广泛报道了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话,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绝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奖牌榜“排名”,公开提出过分重视奖牌榜排名的做法有悖于国际奥林匹克精神。中国国家体委主任刘鹏在总结中国代表团的奥运表现时明确承认,中国在多数体育项目上仍然“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在奥运后的宣传以及政策检讨中,都特意强调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所具有的世界意义,都刻意强调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是中国“履行了对国际奥委会的庄严承诺”。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8月 25日指出,我们并不认为“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8月 25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大标题是“奥运的光荣属于全人类”。奥运会结束迄今各种学术研讨会上的基调,依然是中国必须继续“韬光养晦”,仍然强调“后奥运时代”中国继续保持低姿态的必要性。针对目前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激烈争执,胡锦涛主席 2008年 8月 27日在杜尚别表示,中国希望各方“通过对